

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Hedda Morrison

(澳)赫达·莫里逊 著
董建中 译

北京出版社

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澳)赫达·莫里逊 著
董建中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 (澳) 莫里逊 (Morrison, H.) 著;
董建中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ISBN 7-200-04379-6

I. 洋... II. ①莫... ②董... III. 北京市-地方史
-史料-图集 IV. K291-64

中国版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36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0460

Hedda Morrison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YANG JING TOU LI DE LAO BEI JING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9 × 1194 16 开本 16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00-04379-6/J · 375

定价: 100.00 元

谨以此书

纪念昂里·弗特 (Henri Vetch)

前 言

第一次见到赫达·莫里逊是在她刚刚出版一部极为出色的有关沙撈越的摄影集的时候。当时正值马来西亚形成的前夕，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吉隆坡的人来说，她的这些关于马来西亚联邦新的州成员的照片是一种鲜活和有启发性的介绍。当我们交谈的时候，她谈到了她最初在中国做摄影师的生涯。她在北京的职业生涯是从1933年到1946年。在看到了她有关沙撈越的作品后，我期盼她的有关中国的作品能够同样的精彩，能以她一贯的谦逊风格，作为一个入门者去尽力地描述它们。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见到她的关于北京的照片。我被它的美丽所震撼，它们中的每一幅依然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在她将为本书搜集的照片向我展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当年拍了多少照片以及她如何能一直记住这些照片。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向每一位欣赏摄影艺术的人推荐这些照片。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想到得更多更远。北京是世界上一座伟大的城市，但我们并没有太多有关它的照片。更令人感叹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北京变化太剧烈了，这座城市的绝妙的过去正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变成了思乡的素材。正因如此，这些照片的每一点都唤起了历史的记忆：这座城市过去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材料。依此为标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材料，使所有这些变得更有意义的是，因为它们是曾在亚洲工作过的最好的摄影师的作品。这部作品将作为1933到1946年的北京以及有幸生活其间的人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实录，每一幅照片告诉我们的要比仅用一千个文字介绍得要多得多。

王公武 (Wang Gung wu)

1985年8月于堪培拉

目 录

简介 (1)

城墙、宫殿和园林 (11)

寺庙和牌楼 (45)

街道生活、店铺和集市 (81)

饮食和娱乐 (127)

艺术与工艺 (154)

周边地区 (198)

后记 (244)

参考文献 (245)

简介

在1933年我有机会去中国之前，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这个机会出现在德国摄影学刊上，其中的一则广告征聘一位专业的女性摄影师，负责在北京的哈通（Hartungs）照相馆。这个广告几乎是为我量体裁衣而订做的。它特别要求一个斯瓦比亚（Swabian 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前公爵领地）人——斯瓦比亚人以工作勤奋而闻名——且能讲英语和法语。我的家乡在斯图加特，而且我符合它的语言要求。我当时刚刚完成了在慕尼黑摄影学校的学习，跟随一位叫里兹（Lizid）的杰出的、要求极为严格的摄影家一起工作。我对当时德国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感，渴望能到海外工作，在遥远的北京工作的念头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份工作的薪水并不太多——这是为什么需要一位女士的原因。我后来发觉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而且不论何时，凡有特殊的活儿，不得不迅速完成，加班也没有报酬。

然而，对于这个决定我永远不会后悔，尽管当时我的家庭对此有些担忧。他们的离别赠物是供我防身用的一支手枪和一把伞。当我离开的里亚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登上一艘意大利客轮，我就将这两样东西扔到了舷外。我曾打算穿越西伯利亚旅游，然而这条路线因为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被关闭。

在1938年合同期满之前，我一直呆在哈通照相馆。以后我为英国的比伯（Bieber）小姐工作了好几年，她在北京居住了很长时间，对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品很感兴趣。大部分时间，我住在法国领事让-比埃尔·度波（Jean-Pierre Dubosc）的中国府邸的一个小房间，他是一位中国绘画权威，他那有魅力的妻子是定居巴黎的知名的古文物收藏家卢（C.T.Loo）先生的女儿。我的住所位于紫禁城和南海之间的南长街。

我有条件去参观北京的很多地方，这是在那些日子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我还去中国北部、中部的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进行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旅游。我结婚后于1946年离开了中国。我的丈夫在北京出生，自1940年底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一直在英国大使馆工作。以后我们在沙捞越居住了很长的时间。

我所到达的北京、我负责庞大的并有十七个中国伙计的照相馆所在的北京，作为旧中国的中心，已是处于衰落时期。1421年，这座城市在明朝永乐年间成为中国的首都。它是明代建设的几座城市中的最后一个，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控制着通往蒙古和东北的道路。到了1933年，这座有着宏伟城墙的城市，它的门楼和外护城河仍然没有变化，基本保存完好。它的人口，尽管比巅峰期少，但仍然在一百万以上。

北京是伟大中华帝国首都中的最后一个。它历经了帝国体制的衰落和腐朽，它在1860年和1900年两度被西方军队占领。在后一次所谓的义和团起义中，外国使馆遭到围攻，这座城市遭受了义和团及入侵的外国军队野蛮的洗劫。义和团起义是一场猛烈地反对外国、反对西方的运动，它在世纪交替之际狂卷北部中国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定程度上义和团是民众运动，但它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它在1900年发展至高潮，大范围屠杀

基督教徒、进攻外国使馆。1900年8月，这些使馆在被围攻8个星期之后才得以解脱。

随后，在北京城内，外国使馆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带有围墙的区域，完全是带有雉堞的城墙以及作战地带和坑道。在英国大使馆旁边，原来的使馆的墙还保留着，上面弹痕累累，并且还写着：“以免我们忘记”。除德国之外，所有重要的外国使馆，都有他们的军事卫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北京成为政客与军阀纷争与武力争夺的战利品。但是在1928年，随着蒋介石势力的崛起，首都迁往了处于长江流域、更为全国中心位置的南京。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这意味着他们身在中国，但受他们自己国家法律的管辖，不过德国人除外，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

三十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更为文明的阶段，但这时西方对中国主权完整的威胁已被日本人所强加给中国的、更狠毒的威胁所取代。最开始，日本是因中国对朝鲜拥有主权而与中国争吵，随后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通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摧毁了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赢得了先前属于德国控制的山东的实际控制权。在我到达中国不久，日本人抢占了东北并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他们保持一支强大军事力量，他们的商人到处活动，许多人已经在北京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然而，北京保留着它独一无二的特色。作为一个教育与艺术中心，许多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工艺继续存在。宏伟的城墙里面，数不清的胡同依据北京城对称的格局，南北走向与东西走向排列着。如果你给别人指路或问路，总是用这样的词：向北，到了第二个转弯向东，等等。

北京的建筑，除了一些西方风格的办公与公共设施外，都是平房，用灰色的砖砌成，屋顶是灰色的瓦。墙壁围成家庭院落，富有人家的大门涂着吉利、明亮的红色。你不能够看到里面的房屋，因为在院子里面经常有影壁面对大门，一个人进门后不得不绕过它。这道墙用来阻挡恶魔。从任何角度来看，你都很难想象自己正身处一座伟大的城市：树都种在庭院之中，这使得这座城市一片乡村景象，仅仅有皇宫与寺庙金壁辉煌的屋脊和气势宏伟的城墙角楼点缀其间。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这里曾经是中国皇帝们的豪华的宫殿，但在三十年代，大部分已向公众开放。围绕紫禁城的是所谓皇城，居住着满族高官。紫禁城的西面是一连串的湖泊和园林，它们整个被内城的高墙所包围，内城起初是留给满族军队的。在内城的南面，由较低城墙与之相连的是外城，满族人要求汉人住在这里，但这种限制早已失去了效力。大部分的商业地区位于外城，但除商业区之外，外城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农田。

城市内部以及城墙外面散布着极多的、以满足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建筑物。一些寺庙

年久失修，有的破坏严重，但大多数都向公众开放。许多寺庙保留有施主捐献的土地或是从崇拜者那里得到资助，这样使得它们能够维持生存。破坏严重的寺庙大部分曾经用来临时驻扎军队。

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那些主要信仰，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的大寺庙，对外国参观者有特别的吸引力，但中国的宗教决不局限于这些主要的信仰。同时也存在许多民间信仰和泛灵论，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宗教生活也受儒家的哲学思想影响，对祖先的崇敬是如此地深厚，以致于产生了术语“祖先崇拜”。另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影响。

道教，既有遁世的形式又有世俗的形式，它的信徒大概是最多的。它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老子的哲学著作，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多神的、大众化的宗教，而老子本人的生活也被强烈地渲染成一种奇异的神话。道教的神殿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是开放的。任何人只要对人类有功，死后就被奉为神灵。道教有着男神或女神，或二者都有，监督着几乎每一个人的兴趣、生意和职业。道家通过善行以求长生不老，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一个人通过默念和忌食以及服用魔术般的丹药能够长生不老。宗教促使社会稳定，因为它告诉人们在人间做坏事会遭到天国的报应。中国人是很实际的，甚至在一本道教的书中有一张计分表，罗列了1230种好的和坏的行为，并对每一种行为设定分数。道家相信，灶王爷监视着每一个家庭的所作所为，并且每年要向玉皇大帝上报，或是奖赏或是惩罚。道观中包括许多生动造像：这些标示着将在阴间要发生的好事和坏事。

人们对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了解得更多，他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和哲学家。他的说教不是宗教式的，并不提及对灵魂的拯救或死后的生活。孔子阐发一种道德与伦理体系，这为好政府提供了施政基础。他的学说体现在《论语》里，这本书和另外几本经典以及对它们的注疏成为进入国家仕途的科举考试的考试纲要。在北京有一雄伟的殿堂是纪念孔子的，而且我有幸造访了他在山东的出生地，他的一些后裔仍旧生活在那里。

公元一世纪，佛教从印度介绍到中国。对于这种信仰，中国人抱有同感，因此佛教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以及大量的国家资助。佛教徒企望达到涅槃的境界——完全将灵魂融于宇宙的精神。一个人通过泯灭欲望以及通过“八正道”以达涅槃，这“八正道”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中国流行的大乘佛教与在东南亚流行的小乘佛教大不相同。小乘佛教的教义强调寺院修行的禁欲主义，而大乘佛教则更为自由并且接受倡导善行的菩萨。这些菩萨正在或已经进入佛境，但是他们已经选择留在人间以帮助他人获得解脱。

在北京也有许多喇嘛庙。强调实践的神秘性的印度密宗佛教与古老的包括萨满教在内的西藏本土信仰，以及各种各样对仁慈的和有魔力的神灵崇拜在西藏演化而成喇嘛教。喇嘛教不仅是西藏而且也是蒙古和满族人的信仰。

中国人同时崇拜祖先。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连早期的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也接受了这一点，但有关的仪式和活动都已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普通人的宗教生活基本上都与道教的神灵有关，但是同时又存在一种普通的和更为古老的对自然物的崇拜：天与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许多自然现象，有着树神、花仙以及掌管海河湖井的龙王。中国人有一套精细的“风水”理论。它讲究的是住所与坟墓的地点要与宇宙的气流相和谐。人们常常据此建房、筑堤，有时将道路搞得弯弯曲曲，尽管笔直的道路更为便利，但这样做是为了避开风水上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北方，一些动物比如狐狸、貂、刺猬、蛇以及老鼠受到人们的尊敬。狐狸和貂是家庭的财神，人们常常为它们树立小的神龛。刺猬和蛇也受到尊敬，但它们同时也是不好的征兆、是要避开的。老鼠是善意的，因为它们能够从别的家庭带给它们崇信者以巨大的财富。蝙蝠，在西方被普遍视作讨厌的东西，尽管实际上中国人也并不尊重它，但它却是幸福的一种符号。

一个基本的概念是“阳”与“阴”，这是统治宇宙以及其中的每一事物的互补对立的要素。以前的中国哲学家们感知到处处都有二元性：天与地，雄与雌，日与月，正与负，明与暗，等等。天、雄性积极的元素、明、龙、奇数、蓝色，这些都是“阳”。地、雌性消极的元素、暗、老虎、偶数和橙色都是“阴”。自然万物要么是阳，要么就是阴。

伊斯兰教在陆路由中东传入中国，并且从水路到达中国南方的港口。在中国西部，从过去直至现在，仍有众多的穆斯林，在大多数大城市中也有穆斯林聚集区。北京有好几处清真寺，而且身为饭店老板的穆斯林有些是很出名的。

通过十六世纪末最先到达中国的、具有杰出天份和朝气蓬勃的耶稣会士，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博学、有修养且具有非凡能力的耶稣会士在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尊重，在朝廷有着极大影响。他们对中国人尊孔和敬祖的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包容引起了更为顽固的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也被允许在中国布道。十八世纪初期，梵蒂冈最终宣布支持后者。这反过来惹恼了中国人，尽管基督教的修道会能够继续传教活动，但会众遭受了更多的迫害，再也未能恢复耶稣会士曾得到的尊重与同情。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常常被中国人视为西方对中国打击的一部分，中国人将他们和西方势力的政治扩张联系在一起。

北京开始是明朝的都城，但在十七世纪，明朝被来自中国东北、非汉人的满族人推翻，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于1644年在北京自杀。尽管满族人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字，但他们迅速吸收汉族文化，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与前人没有什么差别。伟大的十七与十八世纪的满族皇帝所带来的是非同寻常的和平、繁荣与统一。十九世纪，衰落降临，此时中国内部面临分裂与腐败，外部则遭受着西方的冲击，极端的保守主义面对风云际会、将中华帝国送上一条无可挽救的衰落道路的世界已无能为力。

除了日渐增多的日本人外，当我到达北京的时候，那里有着相当数量的外国人。尽管首都迁到了南京，但绝大多数外国人仍旧留在了北京，有外交人员、传教士、大学教师、使馆卫兵、商人集团，以及被北京的魅力及在那里能享受到的舒适与有趣的生活所吸引的一小部分流动人口。生活费用很低，住户可以指望得到非同寻常的、有教养的仆人的照顾，这些仆人都是小生意人，他们负责照顾好他们的雇主，反过来可以得到一笔合理的薪水以及一份佣金，不论何时佣金都可能附加在他们的雇主要购买任何的必需品或雇主兴致所至而需求的任何物品之上。在北京的外国人中的厨师特别精通西方烹饪艺术。

对欧洲人来说，只要他们喝开水以及认识到任何可以生吃的蔬菜都必须洗干净，那么北京就是一个有益身心健康的地方。然而，考虑到在北京的欧洲人口规模很小，因此突然死亡的可能性要比预料的可能性大。我认识一位妇女，她被一个顽皮的小猫传染，死于狂犬病。我的一个丹麦朋友因他浴室的炉子产生的一氧化碳而中毒死亡。1946年曾主持我丈夫与我的结婚仪式的英国领事，在他自己婚礼的头天晚上突发脑膜炎，数天后去世。

在北京的魅力与能够体味到的快乐的生活下面，却是沉重的苦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乞讨者并不是贫穷的真实的写照，因为许多人是被专门组织起来行乞的。正是那些不要饭的人才真正反映出最极端的贫穷。不论是捡废纸破布还是在夏天为养鸟的人捉蚱蜢，这种谋生手段常常被人忽视了。冬天许多人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具有坚忍不拔毅力的人们。

北京的冬天异常严酷，很少下雪，气候非常干燥。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湖面一直有很厚的冰，从湖中和护城河中凿冰并将它保存在地下以备夏天使用，这也形成了小规模的行当。北京的主要热能是煤，绝大部分来自西山小煤矿，基本上是由骆驼队将煤从西山运到城里。

大多数中国人的房屋没有供暖设备，但是他们砌有砖炕，将外间炉子的热气传递进来。在欧洲人的房屋以及那些装备良好的中国人的房屋由铁炉子供暖，烟道经过很长的距离才到达户外。这些炉子的用煤由骆驼直接送到家中。为了做饭，人们普遍使用含有粘土成份相当大的煤球。

北京令人不愉快的地方是经常出现沙尘暴，尤其是在初春季节。据说这些灰尘来自蒙古戈壁沙漠，但实际上它们是从中国北部干燥的、植被已被砍伐的地方吹来。有趣的是中国人很早就已学会用半透明纸贴在他们的窗户上，作为隔绝冷空气的方法。

除去沙尘暴，北京的春天讨人喜欢，但是炎热的夏季却是暴虐的，这正是大雨倾盆之时。北京最好的季节当属秋天。一年四季，除了沙尘暴之外，北京光照强烈，以前的中国建筑师们已经充分利用这一点，在重要的建筑上使用了彩色的屋瓦，尤其是雄伟的

帝国宫殿使用了金色的琉璃瓦。

北京的生活不仅娱目，而且也有许多悦耳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货物和食品都沿街道和胡同叫卖。每一种小贩都有自己特别的“器物儿”，或是锣或是喇叭，一般都配有旋律美妙的叫卖声。婚礼和丧葬队伍都有自己的乐队班子。许多街巷娱乐活动都伴有音乐。人们喂养一些美丽的鸣禽，特别是百灵和画眉，因为它们有美妙的叫声，甚至尖声鸣叫的蟋蟀也有人喜欢。蟋蟀养在小笼里，整个夏天叫个不停，直到寒冬到来它们死去为止。北京人也饲养许多家鸽，用绳子在鸽子尾梢拴上很轻的竹哨，当鸽子从鸽笼放出、在城市上空盘旋的时候，竹哨能发出一种颇令人悲伤、像笛声一样的鸣响。

即使在夜间，北京也有属于她自己的、有特色的声音。寂静的夜晚，守夜人出入胡同，常常伴随着木梆发出“梆梆”的声音。这对于防止住户被奸人偷盗很难有什么实际效用，但毫无疑问，听到这种声音，人们会睡得更为香甜。实际上，在北京很少有严重的犯罪，人身安全颇有保障。如果财物被盗并且你找到所丢的东西正在一家商店出卖——正如我碰到的一次那样——店主期望你将东西买回，同时你也期望店主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我将空闲时间用在游历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一般是骑自行车。在北京不可能感到无聊乏味，因为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看、可以去拍照。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得到了最友善和最诚挚的款待。我发现人们乐意作摄影对象，以良好的情绪及耐心满足我的要求，这令我很感激。我曾给数百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拍过照，却记不得有被拒绝的时候。

拍照要求有耐心，因为那时电子闪光灯还没有出现，我不得不经常帮人们摆姿势，要求他们保持非常静止的状态。在北京我仅有一个闪光灯，是一位德国朋友为我精心制造的、一个外形奇特的玩意儿，它用老式的小轿车喇叭的橡皮球茎，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它发出巨大的光亮，对在黑暗的室内摄影很有帮助。同时它也是危险的，有一次当我在西山一座寺庙里拍摄明代壁画时，我就将自己烧伤。缺少可靠的闪光设备，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只拍了数量很少的室内照片。

在过去，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后的第一眼就看见内城东南角高高的城墙和城门。火车道沿着内城南面的城墙到达地处前门外的终点站。城外宽阔的马路上很少有机动车辆，有一些马车、自行车和人力车以及少量的人力平板车。在旧中国，人力是最便宜和最丰富的，因此在交通工具中，人力车最为普遍。当然也有一些数目不多的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车，旧式的、由外国人把持的有轨电车，它们来往于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吱吱当当”作响。

在北京，一年当中传统节日接连不断，这些都是中国阴历的日子，它大约比西历晚一个月。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通常是在阳历二月。人们都提前准备迎接春节，在灶王爷的年画上，人们在他的脸上抹一点儿糖，再把年画在灶火中烧掉，为他向玉皇大

帝报告家中的日常生活送行。吉祥的话写在红春联上，贴在门口，还有新的门神年画。饺子被做成中国传统的银元宝的样子。所有的债务必须偿还。工人们通常能拿到相当于一个月薪水的红利以及享受一年中仅有的几天假期。

在爆竹声中人们迎来新年。人们宴请不断，参拜寺庙，走亲访友。春节庙会很多，位于外城西部的琉璃厂尤其有趣、好玩，这里是由所有经营书画以及其他的艺术品的重要的商人们开办的古玩交易市场。春节也有许多赌博活动。

此后，欢庆活动是在正月十五的灯节，店铺和各家悬挂精制的彩色灯笼，也有许多是送给孩子们的。一些店铺摆放着用冰块制成的灯笼。春节在喇嘛庙举办的叫做鬼节的活动中结束，在这一活动中，戴着狰狞面具的喇嘛书写藏族文字，表演藏族舞蹈。

阴历的二月底是清明节，这几乎与复活节同时。这是中国人拜祭扫墓、向祖先表达崇敬之情、焚烧大量的纸钱的最重要的日子。这些纸钱被认为能自动变成在阴间可以使用的真钱。在阴历的七月与十月人们也进行扫墓活动。

阴历的五月初五，相当于阳历的六月初，是龙舟节。它标志着盛夏的到来，但是它是由在中国南方这一时期举行的赛舟活动而得名的。长长的赛船刻有龙头，有很多划桨，许多水手随着鼓点儿一起划水。在北京，这个节日不搞大规模的庆祝，但这又是一个解决债务的日子。

阴历七月十五是盂兰盆节，人们举行特别的、栩栩如生的活动。人们再一次拜祭墓地。夜晚，人们在湖中或河岔里放逐许多小灯笼，它们顺水飘流，引导游魂走向解脱。三十天后的中秋节，是拜月和家庭团圆的日子，人们互换品尝月饼。这又是一个解决债务的日子。

这仅仅是重要节日的一部分。节日、仪式、集市无穷往复，不论富人与穷人，都同样享用，这给旧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凡的、强有力的社会欢娱活动的框架。

我有幸多次从北京出游，即使交通条件有限，也可游览很多地方。我参观了西山大多数重要的寺庙。西山位于北京城西边，是很大面积的山区。我花了一个暑假时间伙同三个赶驴人和三头驴子参观了“迷失的部落”(Lost Tribe)——一个比西山更远的地方，明末的起义军曾在这里驻扎。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这个地方在帝国时代就禁止缠足，缠足是一种古老的、可恨而野蛮的现象，女子的脚因缠足变成畸形，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当中国其他地区禁止缠足的时候，这里却有人开始缠足。

我去过热河两次，它是清王朝的避暑胜地，位于北京的北面。我也去过山西云冈石窟一次。特别值得回忆的是登临位于陕西的神圣的华山，在陡峭的山峰上建有一组组的道观，道士们给予我最热情的欢迎，甚至将我装扮成一位道士，他们中的一个还用我的相机为我拍照。在山东，我坐上一艘中国船只，从威海卫到青岛，沿着海岸线观光游玩。后来，我登临同样位于山东的神圣的泰山，参观了曲阜，这里是孔夫子的出生地。在

路上我得了猩红热。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霍夫曼 (Alfred Hoffman) 正在写一本有关南京的书，我在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进行拍照，为的是给这本书做插图。这本书恰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上海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南京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但它仍旧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最近，在1937年，这座城市遭到了日本人残暴的蹂躏。

在大部分的旅程中，我是独行客，但我从未感到任何的不安全。面对一个女性的旅行者，中国人所表现的，不一定比平时就更正直、更乐于助人，但不论走到哪里，我遇到的都是古道热肠的中国人。

从德国来到北京，环境变化异常巨大，然而我从来没感觉自己在在中国是一个陌路人。刚来时，我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我同中国同事的关系是令人愉快的，当然这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对中国男人来说，在一个欧洲女人手下干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建立起了和谐的关系，而且我自认为他们尊重我、对我很友好。另外仅有的一家欧洲照相馆是俄国人塞居·瓦加索夫 (Serge Vargasoff) 开设的，他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尽管不是特别会做生意。我们有着稳固的友谊，正是他通知我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并带来一瓶伏特加酒以示庆祝。

照相的顾客中有许多名人，其中的一些成为了我的好朋友，而且通过他们我结识了许多其他的人。在他们中间，我怀念昂里·弗特 (Henri Vetch)，对他特有好感。他是北京饭店的法国书店老板。他的书店是一个北京研究所，那里有一批华美的有关中国的图书，昂里·弗特先生正积极从事出版一整套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他心地善良，精力充沛，极具口才。他的妻子是一位有教养、心地善良和颇有耐心的俄罗斯女性。在星期天，我常常陪同昂里·弗特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方方面面的朋友在西山散步。他允许我从他的书店中借阅我喜欢的任何图书。弗特一生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图书，他于1978年去世。

珀勒·坦哈·德·夏丹 (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 经常来哈通照相馆，他和让·皮埃尔·度波 (Jean-Pierre Dubosc) 是亲密朋友，后来我在度波的家里见过他。夏丹是一位最具魅力的男人，并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继承了那些曾在中国取得成就的、杰出的耶稣会士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具有世界胸怀的人。他与一位美国极具才能的女雕刻家建立了一种长期联系。后来我了解到他是一位宗教思想家和神秘主义者，却能在科学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对此我很惊讶。

在我离开哈通照相馆后，我为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 (Harold Acton) 照了许多相片。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北京度过的，他着重于中国戏剧的研究，我为他照了许多演员的照片。在演出结束后，他经常请演员吃饭，有时我也被邀请出席，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特权，因为我总是在场的惟一的女性。

比尔·卢因森 (Bill Lewisohn) 先生, 是出色的著作《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 的合作者之一, 对于在西山旅行给了我许多特别好的建议, 他对于西山无所不知。另一位作家是美国人乔治·凯茨 (George Kates), 他是《丰腴年代》(*The Years That Were Fat*) 的作者, 这是一部有关北京的引人入胜的作品。我为他拍了一些中国家具的照片, 他对中国的家具有着全面的了解。亚当·冯·特罗特 (Adam von Trott) 视我为朋友, 他后来参与计划行刺希特勒而牺牲。当我与哈通照相馆合同到期的时候, 我的老板, 担心我建立一个与他竞争的照相馆, 因此让我返回德国。他通过德国大使馆给我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并且拒绝给我最后工作期间应得的报酬。我希望能继续留在中国, 特罗特当时正在北京, 我从未请求他为我做些什么, 但当听到我的问题, 他奋起维护我的利益。结果, 我可以留在中国并得到了本属于我的报酬的一半。

我也遇到了一些很好的新闻记者, 其中杰出的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瑞士女士, 名做莉莉·阿贝格 (Lili Abegg)。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企图吞并中国。在报道这一事变过程中, 阿贝格在精力和事业心方面, 超过了她的所有女性同事。她借了我的帆布袋, 向前线进发, 而在此时, 大多数人正忙于在使馆区寻找新闻。

另一位哈通照相馆的顾客是探险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 大约在1936年他来到中国, 带着一大批随从, 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亚洲之行。我与哈通照相馆的电影摄影技师吴先生一起, 陪同赫定去明陵, 拍了一些胶片。那时他年事已高并且有一点同行老大的味道。

大多数哈通照相馆的顾客都是非常愉快和体贴人的, 他们常常讲述他们的经历, 向我展示他们的照片并征询我的意见。自然也会有一些例外, 奇怪的是, 尽管我同美国人的关系总是相当地好, 并且尽管我有许多美国朋友, 但是所有最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都与举止温雅的美人有关。特别耻辱的一件事发生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工作, 生活极其困难。一位身穿美国陆军上校制服的学者要求我拍一套技术难度很大、有关紫禁城的鲜为人知的照片。我在天寒地冻中做这一工作, 却从未得到报酬, 甚至是胶卷等材料费用, 我也没能得到任何补偿。

离开哈通照相馆之后, 我为比伯 (Bieber) 小姐工作, 在戏装饰物方面帮助她改进中国的珠宝和银器, 并且帮助她做刺绣活, 以便于西方人穿戴。比伯小姐颇有创意并极具才能, 但却不能设法与中国人在业务上进行沟通。当参观各种各样的集市, 购买与戏装饰物相配的中国珠宝, 以及收集中国的荷包 (相当于日本的坠子) 的时候, 她也需要我帮助。在这些场合, 她的讨价还价的韧劲常常打动我。她是一个有钱的女人, 但常常放弃能买到好东西的绝佳机会, 要是从经济上考虑, 那花费实在微乎其微。1940年她离开北京到了美国, 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她所收藏的中国荷包现今在芝加哥, 并由斯开勒·卡姆恩 (Schuyler Cammann) 博士写成专著加以描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生活日窘。幸运的是，在1941年我将我所有的、数目很小的积蓄订购了胶卷和相纸，这些东西从德国由铁路运达北京，从时间上看，恰恰是在因德国进攻苏联致使这条路线关闭的前夕。但是我所存有的材料最后还是用完了。法国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搬进了使馆区，我自己一个人住在度波的家里。北京很多地区频繁实行灯火管制，但以前这里还没遇到停电的情况，现在我却遇到了这种麻烦，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电票。也就仅仅过了几天的时间，我就从度波的管家那里得知，我的隔壁早已有电了，那里居住的是一名日本高级官员，他从未受过灯火管制之苦。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北京第一次被从太平洋战场中过来的美国海军新兵占领。一段时期以后，我十分走运，美国红十字会会给我一份工作，照管人们的福利和娱乐，地点是在意大利使馆。他们对我很友善，让我帮忙编一本介绍北京的手册。在邮政投递处，我也成为了一个冰淇淋服务的行家里手。

他们派给我不同的任务，都是需要北京当地的知识。最令人吃惊的工作之一是找一头骆驼，海军官兵能骑在上面照相。当时是在仲夏，找一头骆驼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夏天，骆驼通常被赶到蒙古凉爽的草原。然而，最终，我还是找到了一头母骆驼，它怀孕了，走不了到蒙古去的漫漫长路。它和它的小骆驼一起，被装进巨大的军用卡车，及时运到了意大利使馆。在这里，它有过反抗，但当拍照开始，它就完全服服帖帖了。

我曾被严厉地责斥过，因为在一次出行中，我带领一群海军官兵走得太远，竟然走到了圆明园。我特别记得一位美国随军摄影师，名叫艾迪（Eddie）。他是一位很好的摄影师，而且非常喜欢啤酒，他在黑暗的屋子里工作时，总能很方便地拿到啤酒。一天，我接到艾迪打来的一个焦急不安的电话，征求紧急的处理办法。原来他被指派为前来参观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冲洗照片，他竟然漫不经心地在陈年啤酒中冲洗这一卷胶片。要想挽回损失，却已无能为力了。

1946年秋天，我在北京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主要使用双镜头的禄来福来（Rolleiflex）反光照相机（唉！已不再生产）。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相机了。许多建筑和一些书斋等等是用9×12厘米林霍萨拉玛（Linhof Satzplasmal）相机拍摄的。我住在北京的后期，一些照片是用6×9厘米玛基娜（Makina）相机拍摄的。

城墙、宫殿和园林

北京的城墙大约有四十公里长，墙高九到十二米不等，城墙中间有十六座突出的城门，每一座上面盖有一座城门楼，它们是一座座象征中国过去帝制时代的辉煌的纪念碑。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别的有城墙的城市，但是从未有能和北京的城墙相媲美的。

北京城墙有两个主要的部分。北面的部分叫做内城，最初是为满族统治者保留，仅供手下满族人居住，在形状上大致呈正方形，城墙大约十二米高，有九个城门。其中三个城门朝北京南面的部分开放。南面的部分是外城，满族人要求汉人在那里生活。在形状上外城是长方形，比起内城来东西宽一些，但南北又要窄一些。它的北城墙的大部分与内城的南城墙重合。其余的外城城墙，尽管也引人注目，但只有九米高。外城有九座城门通向北京城外。

城墙由砖砌成，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雉堞和城楼无遮挡地矗立在平坦的华北平原之上。最初，这些城墙与一条外护城河一道起到了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但是在1860年和1900年，它们在西方军队现代的武器面前却显得微不足道了。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观念，以及它在维持内部安全方面的作用，因此城墙又被保留了半个世纪。然而在当代中国发展者眼中，它们毫无用处，所以被拆掉了。

观象台靠近内城的东城墙，它建在一段年代更为久远的城墙上。天文学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是一门发达的科学。天文学进一步的发展是前期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后取得的，他们介绍西方的有关天文的理论。观象台有一些意义非同寻常的仪器，一些是纯中国的，一些是中国工匠依据法国人的设计建造的。义和团期间，许多最好的仪器被德国的占领军作为战利品带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又被归还给了中国。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城墙和城门仍经常维修，很多地方允许人们在上面行走。这里，高居城市之上，一个人能散步数英里，受打扰的仅仅是在矮木丛和杂草中吃嫩叶的山羊，而那些草木就是在城墙上面长大的。在护城河边有许多鸭舍。冬天，人们从护城河凿下冰块运出，以便来年夏天使用。在城边，座落着一些房屋、院落和小型的加工作坊，还有许多开阔的草地、一些耕地。站在城墙向城内望去，地平线上有紫禁城的金色殿宇以及其他许多反映老北京特色的建筑，例如：佛塔、城楼和位于紫禁城北面的高大的钟楼、鼓楼。

钟楼、鼓楼座落在北京内城正面的大门即前门的北面。前门是一座高大的、具有两座城门楼的建筑。事实上，原来的建筑已经在义和团事变中烧毁，这些是后来重建的、年代很近的建筑。今天在前门和紫禁城之间有着广阔的空旷场地，能容得下世界最大规模的阅兵与游行活动。在1949年革命以前，这里有很多建筑，包括许多中国的银行和其他商用建筑。

面对着东西向的宽广的大道长安街的，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西方国家在战争胜利